

你与大自然之间的中介

□刘华杰

最近十多年,博物学由一个冷门变得不那么冷,却远说不上热,个中原因极其复杂。我的学生张晓天最近翻译了《维多利亚博物浪漫》(The Romance of Victorian Natural History,梅里尔著,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版)一书,内容极为丰富、有趣,可配合另一名著《博物罗曼史》(戈斯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来阅读。这本书谈的主要是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博物学是个什么样子,有哪些人参与,它与新兴的自然科学之间是什么关系。这部“二阶博物学”作品的英文版早在1989年就出版了,直到今日才与中国读者见面,它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博物学是个什么东西,作为个体的普通人要不要自己尝试踏入这一领域。

博物学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既容易也困难。打比方或许更直观,我想到了现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介”。

假如你相中一套二手房,对房子的历史不甚了解,对过户手续不很熟悉,对房产合同用词的法律含义没把握,怎么办?俗话说,专业事让专业人来做。于是你找了房产中介。假如你想办移民,这个也得找中介。假如你想找个女朋友,也找中介,过去有媒婆,现在在婚介所,还有各种网络平台。可是谈朋友这件事,你晓得不能全靠中介,至少中介不能替你判断两人是否“来电”。如果中介说他替你谈了两个月,亲自上阵,感觉还不错,推荐你接手并收取中介费,你接受吗?若中介说,通过他的深刻细致“考察”,A不适合你,转而推荐B,你认可中介的感受力和判断力吗?

现在让我们把场景转到人与大自然。作为个体的人,生存于大自然之中,个体是非常渺小的,一个个体如何了解大自然?对于任何生命来说,这都是一个攸关生死、关乎生存质量的大问题。从出生那一刻起,你就在尝试了解这个世界。但是,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是,除了儿时有限的东跑西颠、磕磕碰碰,了解外部世界的绝大部分工作,并不需要亲自进行,体制上早已安排好,每个人都要进学校在特定的环境下学习。学习他人,前人已经总结好了的东西,有非常多的定律和习题,学一辈子也学不完。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对大自然的直接经验比较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而间接经验、书本知识比较多,多到不可胜数。一个有教养的人,特别是科学文化的人,通常是学识渊博的人,讲起地球旋转、宇宙膨胀、引力波探测、基因编辑、量子计算,一套一套的。我认识一位物理学老师,课讲得“贼好”,但他不会、也不敢换灯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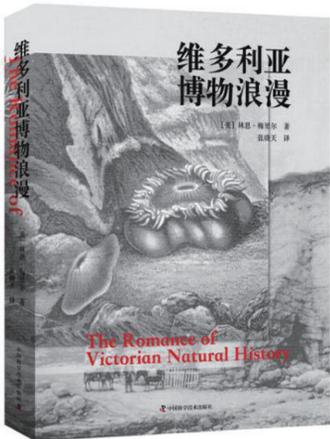
对于大自然的方方面面,普通人已没有话语权。科学或者科技,在其中充当了中介的角色。它是怎样的中介呢?非常专业,平台支撑一流,颇会营销,提供的知识服务相当可观。科技如何做这一点?说来话长,略过细节,简言之,它通过几百年的努力,终于成功取代宗教而成为现代社会最具话语权的“主体”(agent)。过去巫师、牧师行使的职责、扮演的角色,现在都转交给科技专家了。这个“中介”相当厉害,绝对不可小觑。明日天气怎样?从北太平庄到海淀路怎么走?这种植物可否食用?空气污染是否严重?那地方风景美不美?这些问题原来

博物类图书不再小众。不论是常居京东平台童书畅销排行榜前列的《DK博物大百科》,或是表达了中间阶层文化品位的“大英博物馆”系列珍藏本,还是随促销活动火热的启蒙漫画,在通识教育理念的带动下,“博物”已经走向大众。

当下的博物热不是偶然现象,它与信息时代的文化取向及其影响下大众阅读需求的转变有密切联系。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信息量的急剧增加唤起人们学习新知识的需求,不同学科之间的专业壁垒又使得大众更倾向于通俗易懂的知识。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加大了人们通过亲身体验来认识世界的难度,因而关于自然的感性经验比宏大或抽象理念更容易打动读者。与此同时,海量的碎片化信息激发了人们对深度精神消费的渴望,除了准确性以外,知识本身的系统化程度、思维框架的可迁移能力及其背后的价值理念都成为读者关心的内容。

游走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博物类图书提供了一个较优解。博物学是有关自然世界的感性经验,它用一种文学性的修辞去识别和记录江河湖海、草木鸟兽,没有太高的专业门槛,人人都能读懂。为了更直观地呈现,图书大多配有彩绘漫画或高清图文,满足了读图时代人们的阅读期待。除此以外,图文结合实现了难度分阶,多年龄段读者的多次阅读、亲子共读令它们更受青睐。

在人们的印象里,“博物”只是关于物的介绍指南。实际上,作者们组织和阐释“物”所采用的视角也提供了了解世界的新方式。《玫瑰之吻:花的博物学》用对植物的认同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你所不知道的国家一级博物馆》把无数带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局部”视为理解华夏文明的钥匙。文化人类学家张经纬则从物质的生产与消费入手,他的《博物馆里的极简中国史》把文化向心力和离心力同玉器、青铜器、茶叶、瓷器等物质的流动联系起来,又借助魏晋的书法、宋代山水画等阐释社会时局对文化风貌的影响。尽管它们关联事物的方式或推理阐释的过程不一定被所有人认可,但这些认知模式的确拓展了



成特殊的关系,一个人不能不尝试以个人的方式感受、亲证这种关系。而现代教育、高科技,恰恰有意忽略了这一点,一个强大的力量时刻提示我们,别太把自己当回事,要相信专家的专业知识、意见、判断、感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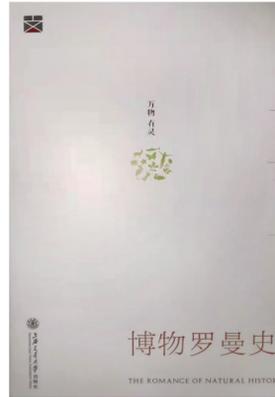
我们今天就处于这样的状态,但维多利亚时代不是这样。

《维多利亚博物浪漫》作者梅里尔(Lynn L. Merrill)说,刘易斯(G.H.Lewis)尽管专注于文学评论和哲学,却用两个夏天在海岸线上寻找海洋生物;诗人丁尼生夸耀自己对沃特科姆湾任何微小动植物都具有亲密而充满爱意的了解;小说家兼社会改革家金斯莱(C.Kinsley)同样愿意花时间在海滨愉快地收集无脊椎物种。“无论社会名流还是普通大众,富豪或者穷人,特权阶层或是平民,都是如此。”“许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发现,将博物学作为一种休闲方式几乎发展成了一种信条。作为一种爱好,博物学意味着无止境的消遣和无止境的教育,在有用的工作层面这一表层之下还隐藏着娱乐。”“面对大自然令人窒息的丰饶,博物学家享受着永不满足的好奇心和奇妙感。”那时,芬芳的花朵、潺潺的溪流、飞舞的蝴蝶、嶙峋的山峦,对每一个接触它们的人来说,不只是知识和有用性,还有意义、情感、信仰,令人激动、着迷。生命在大自然中舒展、行走、觅食、奔跑还有猎杀,哪怕是小鸟、小虫一般的生命也能够感受大地的丰饶、流动和风险,人更不用说。它们/他们不用特意声明探究大自然是自己的一项权利,因为他们拥有这种探究能力,也一直顺利地行使着这项天赋权利。社会化的知识当然也重要,那时各种来源的知识能够互相平衡,包括口耳相传和实际相授的知识,包括自己实际摸索出的知识,也包括文化人书写出来的知识。更重要的是知识本身,而是行为主体是否直接下场操练、知行是否合一。

在维多利亚时代,普罗大众所做的千奇百怪的博物学算什么?娱乐、文学、科学?坦率地说都沾边,都曾被热情拥抱过,可后来都被抛弃了。如今,多数

都要自己体验一下,试错一番而获得结果。现在简单了,不需要自己劳神,科技这个中介做得很专业,因为有气象台、手机导航、植物化学、环境监测、景观评估等专业部门和人员。

社会分工变细,中介增多是必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注定要成为分工的奴隶,并不意味着必须放弃自己探索、求知的权利。人属于大自然,人与大自然之间构



造了人与自然之间沟通的桥梁。人们称他为科学家,在“两种文化”之争中他选择了与阿诺德(M.Arnold)不同的立场,但他还是说过:“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博物学指导的人来说,他在乡野或海边漫步就如同走在一条充满奇妙艺术作品的画廊上,可其中九成他都视若无睹。你应该教他一些博物学知识,再在他手心上放上一本指导什么样的自然物值得细看的图鉴目录。”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乡野,重要的是在人工环境下学习和工作。

维多利亚博物学寻求的不全是硬邦邦的知识,“博物学家通过观察,可以将常见之物转变为神话,将平凡无奇升华到无与伦比的层面”。虽然在英国自然科学与博物学捆绑的特殊文化背景,但是一般而言,在非基督教地区,人们收集自然物、仔细观察大自然,也会有超越性的精神收获。这种收获是无法完全通过中介获取的。现在在认知领域,在感受大自然方面,也要启动一场改革,我们不敢藐视无处不在的、作为权力话语一部分的“科技中介”,却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它,保持独立访问大自然的通道畅通。

人并不从自己探究大自然中找乐,找乐要去游戏厅、夜店、影院甚至战场,有的作家闭门就能写出30集连续剧,有的科学家压根儿瞧不上百姓的业余博物学。维多利亚时代多样性的博物探索,为近代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地质学贡献不菲,这是基本事实。科学史家心有余力之时,自然会照顾到博物学曾经为科学“圣殿”做出过一点可怜的贡献。梅里尔作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文学博士、文学史研究者,旁观了如今学界的施舍,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评论家和历史学家通常把博物学掩盖在科学的大标题之下,而这是不幸的,把博物学当作科学对待,期望它在现代意义上是科学的,对博物学而言是一种伤害,也忽略了它的非凡魅力。”

现在有些学者注意到了博物学的重要性,还把它与科学联系在一起,认为有些博物学还是不错的,经过去粗取精的整理之后,还是可以归入科学队伍的,即可以化作科学的一部分,甚至有学者不无夸张地讲“博物学是完善的科学”。但这也只是少数学者的看法,多数学者根本不把博物学当回事,但梅里尔却说这样的做法是对博物学的一种伤害。

其实这个问题现在很好回答了。经过多年的思索,包括学术思想的多轮自我斗争,我可以给出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平行论”叙述:历史上的博物学,不是什么科学,它就是它自己。它并不需要依靠别的什么学术而树立自己的地位。博物学包罗万象,它施展各种探究手法,对象遍及大自然中的一切,当然现在来看研究的深度可能不够,操纵力也不够强大。那时,具体到维多利亚时代,自然科学,即今日我们从课堂、媒体、实验室、企业与政府了解到的科学,就像刚刚出生的小兄弟,虽然成长迅速,却无法独当一面,更不可能作为一种强大势力站在舞台上。宗教比它强大,博物学也比它资格老得多。达尔文、华莱士、赫胥黎、赫歇尔、莱尔等都是博物学家,当博物学家和科学家两个称号摆在面前时,他们首先认同的是前者,那个时代的社会也是这样认同的。可是,100多年后,博物学(家)却被“不正当地遗忘了”。

赫胥黎十分看好新崛起的自然科学,也愿意人们称他为科学家,在“两种文化”之争中他选择了与阿诺德(M.Arnold)不同的立场,但他还是说过:“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博物学指导的人来说,他在乡野或海边漫步就如同走在一条充满奇妙艺术作品的画廊上,可其中九成他都视若无睹。你应该教他一些博物学知识,再在他手心上放上一本指导什么样的自然物值得细看的图鉴目录。”现在的情况是,人们根本没有时间去乡野,重要的是在人工环境下学习和工作。

维多利亚博物学寻求的不全是硬邦邦的知识,“博物学家通过观察,可以将常见之物转变为神话,将平凡无奇升华到无与伦比的层面”。虽然在英国自然科学与博物学捆绑的特殊文化背景,但是一般而言,在非基督教地区,人们收集自然物、仔细观察大自然,也会有超越性的精神收获。这种收获是无法完全通过中介获取的。现在在认知领域,在感受大自然方面,也要启动一场改革,我们不敢藐视无处不在的、作为权力话语一部分的“科技中介”,却可以不完全受制于它,保持独立访问大自然的通道畅通。

信息时代的“博物”热

□赵琦



读者理解世界的维度。

“以物写史”是博物叙事的发展趋势,文化全球化影响下的“博物”尝试用器物打开观察人类社会视野。“大英博物馆”系列的《世界简史》《人类简史》等引入文化人类学的眼光,它们的书名令人联想到“简史”和“大历史”,但两者有着不同的叙事旨趣和文化立场。大历史、简史站在文明的制高点架构出一套宏大的知识体系,并向读者提供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简便世界观。“以物写史”则意味着带领读者一次次重返前现代的历史现场,借助“人类与他们制造的物品之间那种爱恋与相互依赖的关系”,打破种族、地域、国家、阶级等人为划定的界限。

《大英博物馆人类简史》借助360多件“脸”的艺术作品,从日常饮食、工作、玩耍和仪式、战争等角度全方位展现“脸”表达情感、关系、意义的方式,以此探究不同社会的文化规范如何在整体上塑造人类的自我表达。《大英博物馆世界简史》则将考古学家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发现的人手塑形的石头定为人类故事的起点,那块180多万年前手工砍砸器令馆长尼尔·麦格雷戈和其他研究员确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些非洲祖先的后裔,所有的文化也都从这里起步。因此,人类的共性不仅仅是一种启蒙



式的梦想,而且在基因和文化上也都是事实”。如果说18、19世纪博物学的知识建构还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那么当前的博物叙事则有意识地用不同文明之间跨时空的对话取代共时维度上的竞争关系。而一旦悬置了“野蛮”和“文明”、“落后”和“先进”的评判标准,地方性知识和具体经验成为所有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它们的意义将得以重视。而博物精神也因此而在人文领域描绘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理想,它鼓励所有读者不带偏见地看世界。

博物馆是过往世界的遗迹,博物学则是“远方的知识”。这种“无用”往往最能带给人情感的慰藉。购买行为本质上是对更好自我的许愿,拿在手中的纸质读物比电子书和有声书让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拥有”了知识和闲暇后的满足。博物馆里来自昨日的文化符号启迪人们不再对过去和现在的角度看未来,而是从未来看现在和过去”。从预期的未来回望历史,当下就变为“一幅可供主体选择的全景图”。如果放弃“以我观物”的功利主义而让万物如其所是,那么观者就能跳出紧张的我己关系,也在这种全新的观看方式里重新定义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热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微观层面上有限的抵抗性,表达了人们那种超越功利性的价值评判系统,以及寻找另一种生存状态的隐秘渴望。

式的梦想,而且在基因和文化上也都是事实”。

如果说18、19世纪博物学的知识建构还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那么当前的博物叙事则有意识地用不同文明之间跨时空的对话取代共时维度上的竞争关系。而一旦悬置了“野蛮”和“文明”、“落后”和“先进”的评判标准,地方性知识和具体经验成为所有人人类共有的文化遗产,它们的意义将得以重视。而博物精神也因此而在人文领域描绘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终极理想,它鼓励所有读者不带偏见地看世界。

博物馆是过往世界的遗迹,博物学则是“远方的知识”。这种“无用”往往最能带给人情感的慰藉。购买行为本质上是对更好自我的许愿,拿在手中的纸质读物比电子书和有声书让人更直接地感受到“拥有”了知识和闲暇后的满足。博物馆里来自昨日的文化符号启迪人们不再对过去和现在的角度看未来,而是从未来看现在和过去”。从预期的未来回望历史,当下就变为“一幅可供主体选择的全景图”。如果放弃“以我观物”的功利主义而让万物如其所是,那么观者就能跳出紧张的我己关系,也在这种全新的观看方式里重新定义了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热是一种文化现象,它在微观层面上有限的抵抗性,表达了人们那种超越功利性的价值评判系统,以及寻找另一种生存状态的隐秘渴望。

对待可能性和差异性的开放心态,也正是博物精神对技术时代的重要启示。技术进步的确实降低了偶然性与风险,但过分的技术崇拜将走向极端的算法思维。算法思维试图“运用数据来描述、解释一切客观或主观的对象、关系以及过程”,它假定万事万物都能用数据进行解码和编码。这种盲目的技术自信催生了信息茧房,算法中的人在强化自我认同的同时,也离多元丰富的真实世界越来越远。此时,重视感性体验的博物实践或许能凿开回音壁,而那种相信能在个人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博物精神,或许也能为工具理性指明崭新的价值方向。

近年来,博物类读物在人文社科类书籍中备受关注,本期我们邀请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科普时报》总编辑尹传红、暨南大学文学院青年学者赵琦三位作者,谈谈对这类读物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意义的不同认识。

——编者

读懂大自然这本书

□尹传红

10年前的春季,我亲历的两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上午,我携4岁小儿在北京莲花池公园转悠,于一汪小溪间发现有好些蝌蚪在游弋,惊喜异常。不成想,小几竟漠然以对,无动于衷。我给他讲述小时我抓蝌蚪捉青蛙的经历,他眨着眼睛,像是在倾听一个远古传奇。

而此前不久,我在一个名为“0岁开启自然养育之旅”的主题论坛上,听一位育儿专家谈到引起诸多与会者共鸣的观点:“今天,儿童生活存在着‘去自然化’的趋势,存在着‘自然缺失’状况,令人担心。孩子热衷于与电视、手机、Ipad为伴,却因此错过本应与自然亲近的童年……”

对于当下儿童成长过程中存在的这种儿童与自然之间联系“断裂”的现象,一位十分关注自然的美国作家理查德·洛夫称之为“自然缺失症”。它特指人类因疏远自然而产生的各种表现,如感觉迟钝、注意力不集中、肥胖率增加、生理和心理疾病高发等。

其实,岂止儿童,成人也莫不如此。说来也就是一两代人、三四十年间,我们跟大自然似乎已漠然相隔,与山川、森林、溪流和原野渐行渐远。我们置身于物质充裕的信息时代,生命的信息却有所缺失,成了一种“穴居在钢筋水泥森林中的动物”。这倒真的应了热爱自然的美国作家亨利·戴维·梭罗在大约一个半世纪以前做出的那个断言:“我们都早早地和自然母亲断了奶,钻进了只和人交往的社会。”

有人说,此乃时代使然,亦为现实中的无奈。对此我不敢苟同。我们的生命由自然承载,儿童的灵性更需要自然的滋养。在一个浮躁的年代,人类个体如何亲近大自然,唤醒与大自然最深切的情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洛夫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意识到某种变化。当时,身为记者和儿童权益倡导者的他正在为《童年的未来》做研究,写一本有关家庭生活新趋势的书,为此他在全美城市、郊区和农村访谈了大约3000名儿童和家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家中,人们都会不时谈起孩子们同自然的关系。

比如,有家长提到:“那时候我们总是在自然里玩。不出家门的孩子才是古怪的。”还有家长感慨:“孩子们顺着山坡往下滑(雪),但是他们居然戴着耳机听音乐,他们不会独自欣赏自然的声音,不会自己玩,总要带点什么东西才行。”可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在自然中玩耍似乎有点儿……没出息,古怪、搞笑、幼稚、危险,或是像电视里的情形。一名四年级学生甚至说出了最让洛夫感到震惊的一句话:“我更喜欢在屋里玩,因为只是屋里才有电源插座。”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洛夫把他的担忧、思考和建议,写在了2005年出版的《林间最后的小孩——拯救自然缺失症儿童》一书中。他以多项研究成果和多人的亲身体验告诉读者,与自然的联系能对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健康产生积极的作用。孩子们怎样面对自然,以及将来他们怎样教育自己的后代面对自然,将会决定未来我们的城市、家庭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形式和状态。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作为“全民阅读”重要一环的科学阅读,要倡导孩子们增加科普百科类方面的阅读,特别是关涉生命科学、自然科学、健康卫生等内容的生命意识教育、生命价值教育、生存能力教育和死亡教育四大类图书。近年来,跨领域、博物百科类科普出版物在图书市场销势向好,也备受关注。特别是,自2012年以后科普迈入“图解时代”,有着大量精美配图的博物百科类科普读物开始不断涌现。

如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以精品原创的广义博物学为立足点,向少年儿童呈现科学之趣、自然之美,推出了作为幼儿园科学教育读本的科学博物馆丛书。其以原创作品为主的人文科普产品线,继出版《芳华修远》之后,又先后推出《嘉卉百年中国植物科学画》《遗世独立 珍稀濒危植物手绘观察笔记》等。其中,《嘉卉》是反映我国植物艺术工作者百年辉煌成就和科学精神的精品力作,收录了680幅遍及华夏疆域的典藏级植物手绘作品。此外,该社与全球顶级科普品牌资源合作先后推出的《BBC全景自然百科:飞越地球》《国家地理珍稀鸟类图鉴》《珍稀动物全书:美国国家地理“影像方舟”》等自然科普图书,以高端、稀缺资源的呈现吸引科普爱好者,也形成了热点畅销和长销的局面。

科学普及出版社引进出版的美国史密森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100周年纪念出版物《DK博物大百科》,是目前较为全面的博物学百科全书。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以出版社科类图书知名的出版社,如商务印书馆,近年来也成规模地推出了《看不见的森林》《树木之歌》《神奇的花园》《植物私生活》《逛动物园是件正经事》等多种博物类图书,且市场形势看好。一些科学研究者、博物学者撰写的原创博物类图书也广受好评,如刘华杰著《天涯芳草》《博物人生》《檀岛花事》《勤海植物记》,赵序茅著《红唇美猴传奇》《动物眼中的世界》《动物知道人性的答案》《一鸟一世界:鸟国奇趣之旅》。

就我个人阅读口味而言,近年来读到的一些引进版博物类图书,给我带来了很深的感触,值得在这里向读者推荐。

每一朵花的绽放都在演绎延续数千年的生命传奇。美国作家沙曼·阿普特·萝赛所著《花朵的秘密生命:一朵花的自然史》,将植物学、科学史与回忆录完美结合,再现了植物世界令人惊叹的自然史,富有诗情画意,被赞为“将文字谱以音符”,就像一次绚烂夏日在花田里的徒步旅行。这也是一次奇妙的自然探索之旅,一次领略现代人文和自然景观的美丽而又艰难的旅程。类似的一部作品还有加拿大裔遗传学家铃木大卫和加拿大作家韦恩·格雷迪合著的《一棵花旗松的生命之旅》。

文明背后的野性从未走远。美国博物学者理查德·梅比所著《杂草的故事》,是一部跨越园艺、文学、历史的典范之作,也是一部人类与自然博弈史。作者一方面为大自然中不被待见的杂草类植物辩护,一方面从历史、小说、诗歌、戏剧和民间故事中探究杂草与人类的复杂关系,认为杂草的定义取决于人类看待它们的方式,它们“生动地展现了自然界的生命——以及演化的过程——是如何抗拒为人类文化概念所束缚的。就这样,它们让我们近距离地看到了造物物的两面性是多么的奇妙。”类似著作,还有英国作家迈克尔·麦卡锡所著《消失的飞蛾:自然与喜悦》。

美国作家吉恩·洛格斯登所著《农夫哲学:关于与大自然与生死的沉思》,从一个农民的视角,展开对自然、死亡和永恒等重大主题的深思。作者是在年近八旬得知自己身患癌症时,才动笔写这部心灵自传的。一度不知所措之后,他开始接受无常、观察生命、思索死亡。在他的苗圃里,他恍然大悟:自然界里没有什么会真正死去,各种形式的生命体都在自我更新。相比“死亡”,“更新”才是更适合用于描述生命进程的词。

又一个“世界环境日”即将到来。据悉,联合国环境署将发布“生态系统恢复10年”决议,全球生物多样性大会也将同期在中国昆明召开。想来并不久远,仅仅是在60年前的1962年,当雷切尔·卡逊所著《寂静的春天》首次出版时,在公共政策中还没有“环境”这一条款;而仅在33年前的1972年,里程碑式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只有一个地球”才第一次成为全人类的共识。

然而,人类身为“自然之子”,抑或说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对于自身在自然界中的位置及其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等等,却没有精准、深刻的认识。人类似乎并没有真正读懂大自然这本书。多少年来,人类一直自视为“万物之长”、自然的支配者和操纵者,无所顾忌,不加以制约、持续不断地向自然索取,把自然界搞得破败不堪、乌烟瘴气,在剥夺了人们自身享用之美与福祉的同时,也打破了滋养其精神的静谧。

今天,人类已经能够登上月球、探测火星、走向太空,并且有机会能够用一种新的视野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和我们所处的地球,日渐认识到我们不能把自己从整体中分离出来。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相互联系的,每个物种都与其他物种有关联,都跟地球相关。这或许正是真正读懂大自然这本书的开始。

